

# 澳大利亚强化对华意识形态 遏制及其影响<sup>[1]</sup>

李航

**【内容提要】**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通过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炒作涉港涉疆政治问题、推动中澳经贸议题“政治化”“安全化”、强化澳南太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配合“美澳价值观同盟”转型等举措遏制中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之所以逐渐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囿于高度捆绑的美澳关系、基于澳日益负面的对华认知、为迎合本国日渐保守的政治氛围而做出的选择。澳大利亚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华遏制有助于提高其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但同时也强化了其对美国的依赖关系，恶化了中澳之间各领域合作的政治氛围，并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关键词】**澳大利亚 对华政策 意识形态遏制 美澳价值观同盟 中澳关系

**【作者简介】**李航，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3) 04-0118-20

---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外交能力建设”（项目编号：21BGJ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美国“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的“南锚”，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一直备受关注。自2017年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以来，历经莫里森（Scott Morrison）乃至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澳大利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加强。澳大利亚认为，不断崛起的中国将给澳国家安全、南太乃至“印太”地区稳定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消极认知下，澳大利亚政府大力推动“美澳价值观同盟”转型，努力寻求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开展密切合作，并在涉华问题上主动发难，其对华政策呈现出强烈的制衡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不仅给中澳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影响到广大太平洋地区的秩序稳定。

## 一、澳大利亚强化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表现

自1972年中澳建交以来，特别是从1983年霍克（Bob Hawke）政府开始，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总体特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考虑贸易因素，历届政府始终希望与中国构建成熟的政治和贸易关系。<sup>[1]</sup>1996年开始执政的霍华德（John Winston Howard）政府虽然将美澳同盟视为对外政策的基石，但仍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稳定的战略平衡。尽管中澳长期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且澳大利亚外交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早已有之，但这并未妨碍两国开展正常的合作交流。

2017年以后，在中美博弈加剧、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及澳国内对华认知趋于负面等因素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折性调整，改变了以往的对华外交传统，倾向于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和处理中国议题，刻意强调中澳意识形态差异，渲染所谓“中国代表的异质国家威胁”，并频频做出迎合美国对华竞争部署而牺牲中澳关系的举动，即试图放弃“政经分离”的原则，为随美遏华甘于将中澳矛盾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惜损

---

[1] 王毅：《1949年以来的澳中关系：60年贸易与政治》，喻常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害双方的经贸利益。

### （一）渲染“中国威胁论”

出于遏华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加紧塑造“中国威胁论”，频频发动言语攻势，刻意挑起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对华外交上，澳大利亚政界惯于使用“基于规则的秩序”一词，借机给中国贴上“秩序破坏者”“规则颠覆者”和“修正主义”的标签，以制造中澳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澳政府还将对中国的攻击上升到针对中国执政党和种族问题的层面。例如，澳时任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指责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方式与澳价值观“不一致”<sup>[1]</sup>；澳一些官员甚至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鼓吹对中国进行“病毒溯源调查”。<sup>[2]</sup>

此外，对“中国干涉论”“中国渗透论”等说法的渲染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主基调。这种政策导向既有配合美国营造对中国意识形态攻势的考量，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民众和外部盟伴的支持，以及实现战略资源的有效聚焦。2017年12月，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在议会用中文宣称，澳大利亚人民将“站起来”反对中国干涉。<sup>[3]</sup>他在向议会介绍反外国干涉状况时表示，澳安全情报组织已发出“非常严重的警告”，因此必须“明确制定与中国接触的健康和可持续准则”，“用法律工具来维护澳大利亚的主权”。<sup>[4]</sup>澳议会于2018年6月正式通过了包括“间谍和外国干涉”“外国影响透明

---

[1] Amy Greenbank, “Peter Dutton vows to ‘call out’ China over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cyber hacks,” ABC News, October 11, 2019,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10-11/peter-dutton-calls-out-china-foreign-interference-cyber-hacks/11595750>.

[2] Stephen Dziedzic, “Australia started a fight with China over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VID-19—did it go too hard?” ABC News, May 20, 2020,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5-20/wha-passes-coronavirus-investigation-australia-what-cost/12265896>.

[3] Caitlyn Gribbin, “Malcolm Turnbull declares he will ‘stand up’ for Australia in response to China’s criticism,” ABC News, December 9, 2017,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12-09/malcolm-turnbull-says-he-will-stand-up-for-australia/9243274>.

[4] Malcolm Turnbull, “Speech introduc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Bill 2017,” December 7, 2017, <https://www.malcolmturnbull.com.au/media/speech-introducing-the-national-security-legislation-amendment-espionage-an>.

度计划”在内的反外国干涉法案。2020年12月,《澳大利亚对外关系法》赋予外交部长审查地方政府和公立大学对外缔结协议的权力,以应对中国的所谓“间谍活动”和“对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干涉”。在这些法案的支持下,澳大利亚政府以“反外国干涉”的名义肆意搜查澳籍华人和中国记者的住宅,对中澳双方正常的交流合作进行限制。

## (二) 炒作涉港涉疆政治问题

澳大利亚在涉华政治议题上动作不断。在香港问题上,针对中国拟制定《香港国安法》,莫里森政府曾发表声明称,“国安法将严重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sup>[1]</sup>《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莫里森政府立即宣布暂停与香港间的有关引渡协议,为香港护照持有人留在澳大利亚并获得永久居留权提供便利。其后,澳大利亚政府又数次以“香港的自治、民主和法治遭受侵蚀”为无理指责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拘捕违反香港法律的反对派议员、改革选举制度等。在新疆问题上,澳大利亚政府诬称新疆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要求中国允许联合国观察员进入新疆,并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涉疆人权状况做出的不实评估,甚至通过制定《2018年现代奴隶制法案》《2021年自主制裁修正案法案》和“2021年海关法修例草案”等,对中国挥舞“人权”大棒。

## (三) 推动中澳经贸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

长期以来,中澳在经贸议题上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即使在中澳关系因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的矛盾而趋于紧张时,澳大利亚也坚持奉行“政经分离”原则,以避免冲击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积极推动中澳经贸和科技议题的“政治化”“泛安全化”,力图在全领域加大遏华力度,导致其对华贸易政策逐渐服从于整体国家安全战略,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

[1] Australia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oint statement on Hong Kong,” May 28, 2020,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joint-statement-hong-kong>.

基于对中国所谓“经济胁迫”和“科技侵权”的担忧，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在澳投资进行限制，刻意阻挠两国在农牧业和矿业等领域的经贸交流，大力推动与中国在部分领域“脱钩”。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并成为首个禁止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参与其5G网络建设的西方国家。澳联盟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对此解释称，这些“可能受到外国政府指示”的公司会对澳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sup>[1]</sup>在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采取“双反”措施后，澳旋即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并在国际社会渲染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论”。

2022年5月工党的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为改变中澳关系日益消极紧张的氛围，试图摒弃联盟党处理对华关系的极端方式，转用理性思维对待中澳关系。阿尔巴尼斯声称，“坚守我们的价值观并不意味着不能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与中国合作”。<sup>[2]</sup>在中澳高层对话的拉动下，双方各层级的沟通对话均有所恢复，为两国贸易关系正常化初步营造了良好氛围。但阿尔巴尼斯政府并未完全停止中澳经贸议题的“政治化”“泛安全化”趋势，依然在一些经贸问题上继续指责中国。如将中澳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中国，继续渲染中国投资带来的“安全威胁”等。

#### (四) 强化澳大利亚南太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

为削弱中国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并巩固和加强本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澳大利亚通过高层互访、开展人文交流、提供发展援助等方式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家庭关系”，将西方民主价值观

---

[1] Scott Morrison and Mitch Fifield, “Government provides 5G security guidance to Australian carriers,”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August 23, 2018, [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download/media/pressrel/6164495/upload\\_binary/6164495.pdf;fileType=application%2Fpdf#search=%22media/pressrel/6164495%22](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download/media/pressrel/6164495/upload_binary/6164495.pdf;fileType=application%2Fpdf#search=%22media/pressrel/6164495%22).

[2] Bryant Hevesi, “Anthony Albanese tells China to ‘come to terms with’ Australia standing up for its values – amid ‘lose-lose’ trade sanctions,” Sky News, September 19, 2022, <https://www.skynews.com.au/australia-news/politics/anthony-albanese-tells-china-to-come-to-terms-with-australia-standing-up-for-its-values-amid-lose-lose-trade-sanctions/news-story/5934e89e9e5c853300337abc545b695a>.

塑造为维系澳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长久纽带，以为其影响和干预岛国政治、扩大自身的地区事务参与提供坚实支撑。

2022年5月，澳议会编写的《加强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Strengthening Australia's relationships in the Pacific）报告指出，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植根于共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及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和“天然同理心”。<sup>[1]</sup>阿尔巴尼斯政府也宣称，“我们感受到与太平洋岛国的深刻亲缘关系，希望作为一个家庭的一部分与各国相联”，“我们在危机时期建立了持久的纽带关系，并在和平与繁荣中得以维系”。<sup>[2]</sup>为拉近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澳近年大幅提高对岛国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设立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基金（AIFFP）、建立专门负责南太地区人道主义和救灾任务的机动部队，并持续完善“太平洋劳工流动计划”（PALM）等。

在此基础上，澳大利亚着力塑造太平洋岛国对中国意识形态“威胁”的认知，诬称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不符合“民主价值观”，中国“不透明和无条件的财政援助”损毁了南太地区发展援助计划的“善治根基”，给该地区国家带来了“国家监控工具”和“威权安全实践”。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大肆鼓吹“透明、包容、互利、可持续”的援助高标准，强调对岛国的援助应严格履行《透明度章程》《信息公开法》《国际援助透明度计划》等法律规范，以彰显其区域发展计划之于中国的优势。

#### （五）配合美国向“价值观同盟”转型

所谓“价值观同盟”，就是成员国将维护、宣扬和推广“主流价值观”作为主要宗旨，以提升同盟的凝聚力和行动力。随着美国“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推进以及“遏华统一战线”的逐步成型，美澳同盟的意识形态色彩日渐浓厚。在《2017年外交白皮书》中，特恩布尔政府吹捧美国主导的战

---

[1]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Strengthening Australia's relationships in the Pacific*, March 2022,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Joint/Foreign\\_Affairs\\_Defence\\_and\\_Trade/PacificRelationships/Report](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Joint/Foreign_Affairs_Defence_and_Trade/PacificRelationships/Report).

[2]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Building a stronger and more united Pacific family,” <https://www.dfat.gov.au/geo/pacific>.



后秩序“有力地支持了澳大利亚的利益和价值观”，宣称“将继续扩大和深化美澳合作，鼓励美国强有力地参与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事务”。<sup>[1]</sup>美澳不断强化向“价值观同盟”转型的趋势，借维护“共同价值观”之名行联手遏制中国之实。

一是美澳反复强调“捍卫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2018年美澳首脑发表共同声明，强调两国友谊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以及两国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共同承诺，并指出“捍卫我们的利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sup>[2]</sup>同时，美澳在外交国防“2+2”磋商（AUSMIN）相关文件中提及捍卫“共同价值观”的频率也不断增加，如2021年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及“价值观”6次，并首次用专门章节阐述“民主价值观和多边主义”。

二是美澳以“捍卫共同价值观”为由在多个领域联手行动。近年来，美澳以“人权问题”“国家安全”为借口，加大对中国投资项目的审查与限制，联手建立新的稀土采购链和半导体供应链，倡导所谓“民主、透明的”供应链治理；共同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以“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宗旨的联合军事演习活动；将有关香港、新疆、西藏、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列入同盟行动议程，通过发布联合声明、实施经济制裁等打压中国。澳大利亚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还宣布成立新的工作组，以共同应对“国家赞助的虚假信息 and 干预民主进程等来自中国的威胁”。

三是澳大利亚配合美国推进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小多边合作。澳大利亚在对华实施意识形态打压的过程中高度依赖美国，同时也重视与更多美国的盟国强化“民主伙伴关系”，将“美澳同盟+”作为扩大自身国际事务参与的主要工具，不断推动小多边合作的深度融合和功能拓展。2020年8月，

---

[1]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November 2017,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2017-foreign-policy-white-paper.pdf>.

[2]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Meeting with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Strengthens the United States–Australia Alliance and 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January 23,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meeting-australian-prime-minister-malcolm-turnbull-strengthens-united-states-australia-alliance-close-economic-partnership/>.

时任总理莫里森在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着力强调了美澳同盟以及“五眼联盟”（FVEY）、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小多边机制对“推进自由社会发展、开放市场和主权独立的重要性”。<sup>[1]</sup>在政策表态上，澳大利亚热衷于和美国等盟伴一道使用“基于规则”的政策术语，为其联手遏华提供“合法性”。澳大利亚还以实际行动不断推动完善本国参与的小多边合作机制。比如，与美英构建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共推核潜艇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充实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海上安全、反恐、网络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等。在这一过程中，澳大利亚始终强调各盟伴间所谓的“共同民主价值观”，这既是迎合美国以价值观划线的小多边合作，彰显对美国“单边主义”“霸权思维”的支持，也有共同建立“规锁中国”的统一战线之意。

## 二、澳大利亚强化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原因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和处理对华关系一直基于多重因素。澳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猜疑、寻求域外国家安全保障的偏好、中澳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以及冷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问题，使得两国关系变得异常复杂。<sup>[2]</sup>中澳建交后很长一段时期，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认知保持相对客观理性，并未基于两国意识形态差异制定对华政策。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之所以不断强化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其原因主要包括美澳关系走向、澳大利亚对华认知和澳国内政治三个方面。

### （一）囿于高度捆绑的美澳关系

美澳同盟的建立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后随着冷战的开展和国际格

---

[1] Scott Morrison, “‘Tomorrow in the Indo-Pacific’: address to the Aspen Security Forum, Sydney,”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August 5, 2020, <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search/display/display.w3p;query=Id%3A%22media%2Fpressrel%2F7486844%22;src1=sm1>.

[2] Allan Patience,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Asia: Middle Power or Awkward Partner*, Ge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183.



局的变化，历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不断催化，成为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支柱和实现其中等强国战略的基石。<sup>[1]</sup>目前，美澳关系高度捆绑，且表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

经济上，美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最大的商业、金融、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市场。近年来，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水平呈连年递增态势，2022年累计投资存量达到10922亿澳元，几乎占到外国在澳投资存量的25%，是中国同年在澳投资存量的12.8倍。<sup>[2]</sup>对澳大利亚来说，由于从美国进口的多为精密仪器、电子设备、金融通信服务等“高附加值产品”，美方市场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政治上，美澳建立了各层级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始终保持着紧密协调。澳大利亚政界对加强美澳合作存在高度共识，无论是工党还是联盟党政府都强调美澳同盟对于促进澳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文化上，美澳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双方之间存在天然的文化亲近感和身份认同感，两国都重视维护西方民主价值观，主张与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密切联系。美澳同盟在澳大利亚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据澳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民调显示，每年均有约80%的澳大利亚人认同美澳同盟对澳国家安全的重要性。<sup>[3]</sup>安全上，澳大利亚认为自身安全取决于西方大国在国际力量平衡中的优势，并通过提供“前沿防御”帮助美国维持战略布局。<sup>[4]</sup>美国则通过派遣驻军、举行联合军演、开展军贸合作等形式为澳大利亚提供安全保障。

鉴于此，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深受美国影响。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

---

[1] 崔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2] 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Australia: Supplementary Statistics,” <https://www.abs.gov.au/statistics/economy/international-trade/international-investment-position-australia-supplementary-statistics/latest-release>.

[3] Lowy Institute, “US alliance: importance to Australia’s security,” <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charts/us-alliance-importance-australias-security>.

[4] Coral Bell, *Dependent Ally: a Study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84-185.

美国大力塑造以中俄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威胁，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断凸显。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俄视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美国与中俄的斗争是“支持自由社会的人们”和“支持专制制度的人们”之间的根本政治竞争。<sup>[1]</sup>以中国为意识形态打压目标，刻意将中国塑造为西方世界共同的意识形态挑战，引导中美竞争向意识形态方面转变，并建立全政府、全领域、盟伴协同的规锁体系，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新思路。美国政府各级高官在多种场合大肆渲染中国威胁，拉拢盟伴参与对华意识形态竞争。2020年6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丹麦主办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呼吁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和民主联盟，以“共同反对专制，促进自由和繁荣”。<sup>[2]</sup>

拜登政府执政后，继续强化中俄等国的“异质国家”和“意识形态威胁”标签。202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我们面临着—个民粹主义抬头、民主衰落、中俄等威权国家竞争的世界”，“独裁者们正在加班加点地破坏民主，输出一种以对内压制、对外胁迫为特征的治理模式”。<sup>[3]</sup>美国各界把中美竞争定义为“民主与威权、专制与自由、自由市场与国家主导之争”。<sup>[4]</sup>基于以上叙事，拜登政府高度重视联盟体系对维护美国利益和西方“普世价值”的作用，试图扩展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纽带的联盟体系，以提高联盟的凝聚力、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构筑更广泛的“反华统一战线”。

---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 Michael Pompeo, “Europe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9, 2020, <https://2017-2021-translations.state.gov/2020/06/19/europe-and-the-china-challenge/index.html>.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4] Joseph Biden, “Biden’s Speech to Congress: Full Transcrip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4/29/us/politics/joe-biden-speech-transcript.html>.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其一方面受到美国的拉拢施压，需要在相关问题上有所回应，另一方面也有配合美国的“民主国家同盟战略”来维护本国利益的考量。澳深信“民主共同体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的至关重要作用”<sup>[1]</sup>，认为加入和强化美国主导的价值观联盟有利于抬升其地区影响力、维护其所珍视的所谓“民主制度”和“自由秩序”。

## （二）基于日益负面的对华认知

国家利益一直是外交政策的基础，推崇价值观只是为了服务国家利益，而不会成为外交政策的核心。<sup>[2]</sup> 澳大利亚推崇价值观外交的实质是为了加强与美国等盟伴的合作关系、减少大国竞争给自身带来的政治风险、提升其中等强国地位。在中澳实力差距不断扩大、澳大利亚担忧中国会对其国家利益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中澳既有的意识形态差异便会被放大，致使澳大利亚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中澳关系，并凸显出较强的制衡色彩。

其一是担忧“中国干涉和渗透澳国内政治进程”。中澳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蓬勃发展，既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日益密切，也加剧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威胁其政治安全的担忧。澳大利亚政府声称其政治安全正在遭受“隐秘的”“强制的”和“腐败的”外国干涉行为的威胁<sup>[3]</sup>，其中包括在澳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存在“间谍”行为，以及中国企业与澳官员过从甚密可能影响澳选举进程等。这些论调在澳大利亚国内持续发酵，并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夸大为“中国正在破坏澳所高度重视的人权、选举自由、政治公开等

---

[1] Simone van Nieuwenhuizen, “Australian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concep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3, No.2, 2019, pp.181–197.

[2] Snehalata Panda, “Value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America’s Public Diplomacy,” *The IUP Journal of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4, No.3 & 4, 2009, pp.105–119.

[3] Malcolm Turnbull, “Speech in Introduc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Bill 2017,” December 7, 2017, <https://www.malcolmturnbull.com.au/media/speech-introducing-the-national-security-legislation-amendment-espionage-an>.

西方民主原则”。

其二是担忧“中国威胁南太地区的民主秩序”。澳大利亚通常视南太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sup>[1]</sup>，并将“促进民主活动”作为建立和维持其在该地区事务中主导地位的主要途径。长期以来，澳大利亚通过援助经济建设、监督选举过程、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力量等促进太平洋岛国的“民主治理”。这些兼具人道主义援助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外交措施，不仅增强了岛国对澳大利亚政治和文化的认同感，而且树立了澳大利亚在南太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而近年来，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交流不断发展，双方建立了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安全合作框架、加强中国对南太国家发展援助等方式巩固双多边合作。2021年，中国同南太建交岛国的贸易总额已达53亿美元，对它们的直接投资额达27.2亿美元。<sup>[2]</sup>据洛伊研究所统计，中国在2020年对南太地区投入了1.68亿美元的援助，仅次于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新西兰。<sup>[3]</sup>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以及随之带来的新援助模式和发展实践，将削弱南太国家对澳所主导的“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进而冲击到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

其三是担忧“中国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经常以“国际良好公民”来标榜自己模范遵守国际秩序，其对国际秩序的话语叙事近年来经历了由“自由国际秩序”“自由秩序”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转变，这本身存在专门针对中国的意图。<sup>[4]</sup>

---

[1] Hugh White, “In denial: Defending Australia as China looks south,” *Australian Foreign Affairs*, No.6, 2019, pp.5-27.

[2] 中国外交部：《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清单》，2022年5月2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

[3] Lowy Institute, “Lowy Institute Pacific Aid Map,” <https://pacificaidmap.lowyinstitute.org/>.

[4] Adam Breuer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Memos, Narratives and the Emergent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 No.4, 2019, pp.429-455.

一方面，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崛起冲击了美国的领导地位。澳大利亚将美澳同盟视为自身重要的安全保障，同时作为战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澳也高度认同和支持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sup>[1]</sup>而中国的不断崛起特别是在地区问题上争取战略主动的行为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能否有效提供安全保护的疑虑。澳认为相对于大国竞争，由美国主导、通过“自由规则”调节权力关系的国际秩序更加有利于澳大利亚处理大国关系、减少国际政治风险<sup>[2]</sup>，也更有利于维护其在南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对“民主共同体”构成威胁。澳大利亚坚持认为，西式民主不仅保障了本国的经济繁荣，也构成了其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基础，因而是其立国之本。这套理念使澳大利亚坚信西方民主价值观对维系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作用，因此，其往往将中国“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上升到价值观层面，视之为对“民主共同体”的共同威胁。

“民主和平论”正是近年来澳政府不断强调中澳之间在核心价值观上存在差异的原因。<sup>[3]</sup>

### （三）迎合澳国内日渐保守的政治氛围

澳大利亚两大主流政党的传统和偏好、政党内部不同派别的利益诉求、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的利益纷争和妥协交换，共同影响和塑造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内容与方向。<sup>[4]</sup>在对华关系上，澳两大政党均强调要“捍卫自由

---

[1] Christian Wirth, “Whos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ustralia,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4, 2019, pp.484-488.

[2] Nick Bisley and Benjamin Schreer, “Australia and the Rules-Based Order in Asia Of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 *Asian Survey*, Vol.58, No.2, pp.309-310.

[3] 许少民：《国家利益、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重置》，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81页；Benjamin Reilly, “Why Is ‘Values’ the New Buzzword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Hint: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China)” *The Conversation*, August 5, 20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is-values-the-new-buzzword-in-australian-foreign-policy-hint-it-has-something-to-do-with-china-143839>.

[4] 宁国辉：《政党政治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3期，第101页。

和西方民主价值观”，并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攻讦政治对手、争取党内力量和选民、拉拢小党的工具，极大地推动了澳大利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采取对抗性姿态。

首先，突出对华意识形态对抗是澳执政党宣示政治立场的结果。在澳大利亚政治体制下，由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因此，执政党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拥有较大自主性。2013—2022年，澳大利亚长期由联盟党执政。该党传统上对外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惯于从意识形态视角看待中澳关系，从而极大地强化了澳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在党内出现了许多对华强硬人士。如前两任总理特恩布尔和莫里森均对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他们重视美澳同盟关系，将政治和安全利益置于经贸利益之上，倾向于挑起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矛盾；时任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诬称中国正在扩大影响力和干预澳大利亚的民主进程，并呼吁“民主国家”共同抵制“亚洲超级大国”的恐吓<sup>[1]</sup>；时任内政部长（后改任国防部长）彼得·达顿、移民部长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都认为中澳两国价值观不一致并对中国的价值观进行攻击<sup>[2]</sup>；时任助理国防部长安德鲁·海斯蒂（Andrew Hastie）也表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sup>[3]</sup>这些人均在澳国内担任重要职务，或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或对政策的实施发挥着重要影响，能够强化澳大利亚对抗中国所谓“价值观威胁”的决心和意志。此外，主张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倾向在澳大利亚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中越来越

---

[1] James Paterson, “Anniversary of Australia’s first Magnitsky-style sanctions,” December 8, 2022, <https://www.senatorpaterson.com.au/news/anniversary-of-australias-first-magnitsky-style-sanctions-media-release>.

[2] Amy Greenbank, “Peter Dutton vows to ‘call out’ China over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cyber hacks,” ABC News, October 11, 2019,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10-11/peter-dutton-calls-out-china-foreign-interference-cyber-hacks/11595750>.

[3]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ce, “Interview with Sharri Markson,” Sky News, March 6, 2022, <https://www.minister.defence.gov.au/transcripts/2022-03-06/interview-sharri-markson-sky-news>.



明显。如2020年10月，自由党参议员埃里克·阿贝茨（Eric Abetz）在议会听证会上要求澳籍华人谴责中国共产党并声明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忠诚。<sup>[1]</sup>

在这种反华政治宣传下，即使一向重视对外经贸合作的工党也出现了一些鼓吹意识形态竞争的声音，以免被贴上“亲华”“亲共”标签。如现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曾强调要确保澳大利亚的“民主韧性”，并鼓吹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促进、保护和捍卫西方民主价值观”。阿尔巴尼斯总理相对来说虽然实用主义思维更强，甚至曾被视为“愿意跨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合作者<sup>[2]</sup>，但同样也强调维护澳大利亚的西方民主价值观。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华遏制是澳执政党巩固政治地位的需要。在两党体制下，获得或延续执政权不仅事关各大党政策主张的推行，更涉及实现其所代表政治集团的现实利益。自2017年以来，在日益失常和保守的政治氛围下，应对时常面临的执政危机是澳历届政府推动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主要动机。

具体来说，一是借涉华意识形态问题攻讦政治对手。联盟党经常借“中国议题”抨击工党，如批评维多利亚州的工党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带来了“外国干涉”。作为回应，工党也强调不能为了经贸利益而损害澳“民主价值观”。两党还互相指责对方议员的“亲中”行为。这严重恶化了澳国内的政治氛围，一度使“反华”和突出中澳意识形态差异成为“政治正确”，一些主张深化中澳贸易合作的利益集团也基本处于“失声”状态。二是利用“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争取党内力量和选民。为维系党内团结和自身领导地位，特恩布尔和莫里森刻意迎合党内的“反华”声音，导致

---

[1] Su-Lin Tan, “Senator insists Chinese-Australians condemn CCP at inquiry on diaspora issues, sparking backlas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5, 2020,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eople/article/3105689/senator-insists-chinese-australians-condemn-ccp-inquiry-diaspora>.

[2] Byron Kaye, “Australia’s Albanese: a pragmatist who promises unity,” The Reuters, May 21,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australias-albanese-pragmatist-who-promises-unity-2022-05-21/>.

以达顿和海斯蒂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不断扩大。常年受澳国防部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资助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则持续鼓动澳应重视中国“对自由、开放、可预测的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在丑化中国形象、引导国内“反华”舆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一些媒体也在“中国议题”上推波助澜。如2017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在其电视节目“Four Corner”中炒作“中国政府组织在澳留学生举行反澳政府示威并在学生群体中建立间谍网络”，还诬称中国政府和澳籍华人向澳官员提供不透明的政治捐款。<sup>[1]</sup>这引起了澳大利亚民意的强烈反应，也为澳政府推动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提供了助力。三是通过强化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拉拢小党。在澳大利亚政界，鼓吹种族主义、煽动民粹情绪、持坚定反华立场的单一民族党、联合澳大利亚党等极右翼政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向这些小党作出一定倾斜并在部分议题上作出妥协，使它们可以间接参与到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之中，有利于争取它们的支持。

### 三、澳大利亚强化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影 响

澳大利亚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华遏制，既受到来自国内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也得到了美英日等所谓“价值观盟友”的支持，对本国、地区和国际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提高澳大利亚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事务的参与度。澳大利亚调整对华政策，深受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美国推行遏华战略，以及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分化重组的影响。通过契合美国打造“民主国家同盟”的需要，澳大利亚借助“意识形态”大旗提高了其在西方世界的外交参与度。在对华外交上，澳大利亚试图以夸大意识形态差异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惯于打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旗号介入涉华议题，包括加大对南太地区的战

---

[1] ABC News, “Power and influence: The hard edge of China’s soft power,” June 5, 2017, <http://www.abc.net.au/4corners/power-and-influence-promo/8579844>.

略投入、干涉中国内政和中国周边议题、在国际社会单独或共同发动对华舆论攻势等。这些举措有利于澳大利亚在西方世界拓展外交资源和空间，树立自身“维护国际规则”“尊重多边主义”的国际形象。此外，在美国“民主国家同盟”框架下，澳大利亚不仅成为了美国“印太”秩序新构想的重要一员和“印太”概念中的关键节点，而且获得了美英等国在各方面的支持援助，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二是强化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关系。一方面，随着澳大利亚日益把中国视为“长期的意识形态挑战”，其在美澳同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对美澳同盟的投入也超越以往，从而造成了其对美国不可避免的路径依赖<sup>[1]</sup>，并受制于美国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价值观动员已成为美国进行盟友体系管理的主要工具，可助其缓解盟友体系内部的分歧并加强各国在大国竞争中的协调。澳大利亚作为该体系的成员，其外交自主性难免会被削弱。从现实情况来看，推行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澳大利亚更加倾向于追随意识形态上相近的美国，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倡议和机制来践行自身“对自由、民主和法治价值观的共同承诺”，同时日益强化自身对中国作为“异质国家”的身份认知。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越来越偏离传统上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与美国的战略捆绑不断加深。

三是恶化中澳之间各领域合作的政治氛围。中澳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长期存在，但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并未演化为根本性冲突。而近几年来，澳大利亚无视中澳深厚的经贸关系现实，刻意突出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着力加强对华意识形态遏制，严重破坏了中澳之间的政治互信。据清华大学中外双边关系数据库资料显示，中澳关系分值已从2017年的6.2下降到2022年的-1.7。<sup>[2]</sup>在社会层面，由于保守势力的政策引导和舆论宣传，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不断加深。洛伊研究所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

[1] Thomas Wilkins, "Re-assessing Australia's Intra-alliance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5, No.1, 2019, pp.9-32

[2]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与大国关系分值表(1950—2023年1月)》, 2023年4月10日, <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info/1145/5980.htm>。

澳大利亚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民众降到了 32%，而对中国在澳投资和政治体制持负面看法的民众则分别达到了 79% 和 92%。<sup>[1]</sup> 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还上升到行动层面，澳国内以华侨华人为目标的种族攻击日益频繁。洛伊研究所 2021 年调查显示，37% 的澳籍华人认为其因自己的族裔背景而受到了差别对待，18% 的澳籍华人遭受了人身威胁或攻击。<sup>[2]</sup> 这不仅严重恶化了中澳之间各领域合作的政治氛围，也损害了中澳关系正常发展的社会根基，为中澳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不可忽视的障碍。

**四是冲击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战略，在意识形态领域挑衅和对抗中国，将中国的外交行为与价值观相联系，按意识形态区分敌友和划分阵营，并企图挑动南太等地区的意识形态对立，激化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加大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强调的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合作，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对抗性和排他性，特别是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地区合作机制之外，这是人为在亚太地区制造和扩大分裂。这种合作模式将导致各国只关注自身和盟伴利益，而忽视全球安全治理的协调和合作，使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变得更加困难。此外，意识形态冲突具有不可控性，因为意识形态竞争是思想观念上的对抗，容易将对方视为邪恶势力并引发你死我活的全面对抗。<sup>[3]</sup>

## 结语

意识形态因素在澳大利亚的对华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澳

[1] Lowy Institute, “China,” <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themes/china/>.

[2] Natasha Kassam and Jennifer Hsu, “Being Chinese in Australia: Public Opinion in Chinese Community,” Lowy Institute, March 2021, <https://interactives.lowyinstitute.org/features/chinese-communities/report>.

[3] 阎学通：《防范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思维》，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1 期，第 7 页。

大利亚之所以不断加强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是因为受到美国“民主国家同盟战略”、澳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澳国内挑动意识形态之争等因素推动。但澳大利亚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中澳关系，无法忽视多种制约因素的存在。

一是中澳之间存在深厚的经贸联系。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澳对华出口约占其总出口额的 1/3。2020 年 5 月以来，中澳贸易摩擦升级，澳经济受到一定冲击。如葡萄酒、牛肉、龙虾等行业的出口额均大幅下跌；大麦和煤炭出口虽然找到了替代市场，但丧失了原有的价格优势。而在铁矿石、液化天然气、羊毛等大宗商品上，中澳双边贸易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叠加冲击下，2021 年第一季度，铁矿石占澳大利亚商品出口总额和对华商品出口额的比例仍分别达到了 38% 和 77%。<sup>[1]</sup> 这表明澳大利亚难以找到与中国匹敌的替代市场，即使是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浓厚的莫里森政府也试图在大宗商品领域保持对华合作关系。此外，在政府换届、“中国替代”努力失败、经济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更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政府恢复和加强中澳贸易合作，为阿尔巴尼斯政府回调对华政策创造了一定空间。

二是美国推行“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动力不足。目前，美国国内危机重重，民主、共和两党为了一己之私斗争日益激烈，社会撕裂严重，经济长期面临滞胀风险，提振经济和赢得 2024 年总统大选被拜登列为主要施政方向，其外交为内政服务的特征明显。美国在长期打压和遏制中国效果不彰的情况下，开始密集派遣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John Blinken)、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L. Yellen)、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John Forbes Kerry) 等多位高官或重要人物访华，体现出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迹象。另外，特朗普执政时期长期甚嚣尘上的“美国优先”论调所造成的美国与盟国之间的裂痕短期内难以消除，美国拢络盟友推行“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存在一定的阻力。美国推行

---

[1] Australia Government, “Australia—Iron ore to China drives export performance,” <https://www.exportfinance.gov.au/resources/world-risk-developments/2021/may/australia-iron-ore-to-china-drives-export-performance/>.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动力不足，势必会影响到澳大利亚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决心、信心和效果，并导致其在一定时期产生摇摆和回调。

三是澳大利亚的国际感召力相对有限。澳大利亚虽然常常以意识形态为由指责中国，但在事关本国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却往往奉行双重标准。例如，澳大利亚屡屡谴责他人权状况，自身人权状况却数次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评，包括难民和庇护者的待遇、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社会活动家的法律保障、原住民的不平等遭遇、国防军在海外行动中犯下的战争罪行，等等。此外，作为亚太地区国家的一员，澳大利亚却一味追随美国，对华大搞意识形态遏制，甚至不惜挑动地区阵营对立、军备竞赛等，也招致了太平洋岛国以及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的不满，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的地区威信和国际道义。

就中澳关系而言，澳大利亚的意识形态偏见是导致其恶化的主要原因。中国需要妥善应对中澳关系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积极塑造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共同利益关系，并坚决回击澳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和打压。同时，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理念，与亚太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在地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挫败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地区挑起意识形态之争的企图。

【收稿日期：2023-04-05】

【修回日期：2023-07-07】

（责任编辑：李万胜）